

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发展演变

□ 董雪迎

所谓墓室画像,一般来讲,凡与墓室相关的一切图像皆可包含在内,既有墓葬建筑本身的装饰(如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也有葬具(如棺床、棺槨、墓志)和其他特殊设施(如漆木屏风)上的图像等^[1]。作为墓葬的重要组成因素,墓室画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墓葬所处时代的葬制、葬俗等内容,对其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地区是北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已发现、发掘了数量众多的北朝墓葬,其中有一定数量墓葬有墓室画像。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及相关资料,对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发展及演变作初步研究,舛误之处以求指正。

一、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考古发现

多年来,山西地区已发现较多北朝时期的墓室画像,相关墓葬已达近20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较为多样。从地域上看,大同地区发现最多,且时代集中于北魏时期,主要有沙岭M7壁画和漆皮(435年)^[2]、宋绍祖墓石槨壁画(477年)^[3]、司马金龙墓漆板画(484年)^[4]、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229棺板画^[5]、湖东M1棺板漆画^[6]、智家堡墓棺板画^[7]、智家堡墓石槨壁画^[8]、文瀛路M1壁画^[9]、云波里路M1壁画^[10]、陈庄墓壁画^[11]等。其他地区相关墓葬还有榆次北魏方兴石棺画(518-519年)^[12]、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壁画(562年)^[13]、朔州北齐水泉梁墓壁画^[14]、太原北齐热电厂墓壁画^[15]、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570年)^[16]、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571年)^[17]等。众多墓室画像的发现,为研究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葬制、葬俗及相关物质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出土墓室画像墓葬的形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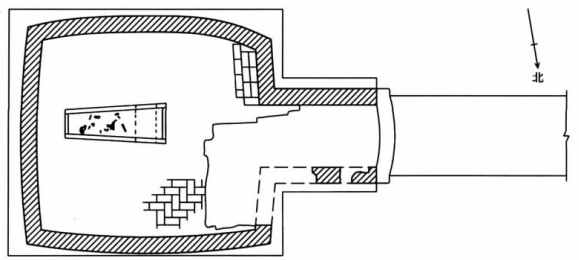
山西地区出土墓室画像的北朝墓葬基本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等组成。根据墓葬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式等,将山西地区出土墓室画像的北朝墓葬分为两型。

A型:砖室墓。墓道与墓室之间有甬道相连。墓道平面多梯形,部分连接天井和过洞。甬道平面多长方形,均为券拱顶。部分墓葬设有封门墙。墓室数量、形状不一,顶部多为四角攒尖顶和穹隆顶。依据墓室数量分为两亚型。

Aa型:单室墓。墓室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壁弧凸,砌筑于近方形土圜内。依据墓室四壁弧凸程度和墓室形状分为三式。

式:墓室四壁微弧凸,平面呈弧边长方形,长宽之比接近1.2:1。大同沙岭M7,方向272°,斜坡墓道,长方形拱券顶甬道。有一道封门。墓室东西长3.42、南北宽2.86米,为四角攒尖顶。墓室四壁和甬道顶部、侧部绘有壁画,保存基本完整,墓室中部残存大量彩绘漆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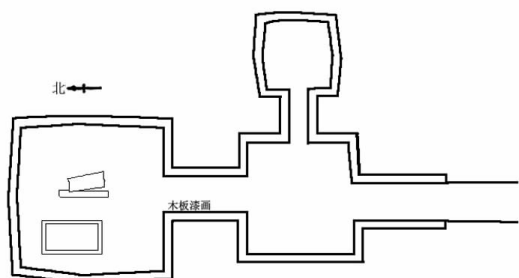
式:墓室四壁微弧凸,平面呈弧边长方形,长宽之比接近1.1:1。大同云波里路M1,方向



图一 Aa 式墓葬(大同云波里路 M1)



图二 Aa 式墓葬(朔州水泉梁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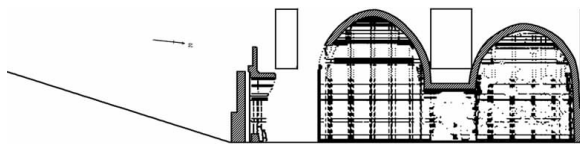
图三 Ab 型墓葬(司马金龙墓)

280°，长斜坡墓道，上口略窄于下口，平面梯形。甬道平面长方形，有砖砌封门墙。墓室东西长 4、南北宽 3.52 米，四角攒尖顶。墓室四壁和甬道两壁之上残存壁画（图一）。另有大同文瀛路 M1 和宋绍祖墓等。

式：墓室四壁弧凸明显，平面呈弧边方形，长宽之比接近 1:1。朔州水泉梁墓，方向 150°。斜坡墓道，平面梯形，甬道平面长方形，顶部两伏两券。甬道南端有一道封门砖，石质墓门。墓室 4.5 米见方，双层穹隆顶。墓室四壁和顶部以及甬道两壁和顶部绘有壁画，大部分壁画保存较好（图二）。另有寿阳库狄迴洛墓、太原热电厂墓、太原娄睿墓和太原徐显秀墓等。

Ab 型：双室墓。为前后室，以甬道相连。前后室四壁多弧凸，部分前室有一个耳室，四壁亦弧凸。司马金龙墓，方向南偏东 6°。斜坡墓道，平面长方形，墓门条砖封闭。前、后室与耳室平面均近方形，东西略长。后室较大，顶均为四角攒尖式。后室甬道西侧残存漆板画，较完整的有五块（图三）。另有大同湖东 M1 和大同陈庄墓（图四）等。

B 型：土洞墓。无甬道，墓室无砖砌，系生土挖成。墓道斜坡状，上口宽于下口，多呈梯形。墓室平面呈梯形，墓顶多由墓门向内倾斜，部分呈拱形。智家堡棺板画墓，方向 287°。洞口封门以



图四 Ab 型墓葬(大同陈庄墓)

未经烧制的土坯平铺砌筑。墓室顶自前向后倾斜，斜顶，长 2.45、宽 0.82~1.55 米。墓室内残存三块彩绘棺板画。另有大同南郊北魏 M229 等。

三、出土墓室画像墓葬的分期

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结合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资料及北朝历史分期，可将山西地区出土墓室画像的北朝墓葬分为四期。

第一期，主要包括 Aa 式墓葬。典型墓葬如大同沙岭 M7，根据该墓出土漆皮上残存隶书题记考证，此墓年代应为公元 435 年左右。故本期的年代应大致相当于公元 386-439 年，即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到太武帝拓跋焘统一黄河流域。

第二期，主要包括 Aa 式、Ab 型和 B 型墓葬。典型墓葬为宋绍祖墓（477 年）和司马金龙墓（484 年）。根据两墓出土的墓志，确定本期的年代应大致相当于公元 439-496 年，即道武帝拓跋珪统一黄河流域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属于本期的墓葬还有大同南郊 M229、大同湖东 M1、大同智家堡棺板画墓、大同智家堡石椁墓、大同文瀛路 M1、大同云波里路 M1。

第三期，主要包括 Ab 型墓葬。典型墓葬为大同陈庄墓。该墓出土的陶女俑头、男俑头与洛阳地区出土的陶俑形象及小冠相近，石封门两侧彩绘守门人服饰与中原地区汉族服饰相同^[18]，故该墓年代大致相当于公元 496-534 年，即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到北魏分裂。此外方兴石棺上有题记，根据题记可知此棺为北魏神龟年间（518-519 年），故也属于本期。

第四期，主要包括 Aa 式墓葬。典型墓葬为太原娄睿墓（570 年）和太原徐显秀墓（571 年），二者年代相当于公元 534-577 年，即东魏北齐时期^[19]。属于本期的墓葬还有寿阳库狄迴洛墓（562



图五 墓主夫妇并坐图(智家堡石椁壁画)

年)。此外,太原热电厂墓出土的鸡首壶和陶俑在造型甚至尺寸与韩裔墓(567年)几乎完全相同,壁画手法与风格与娄睿墓接近^[20],此墓应属本期。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 and 壁画判断,朔州水泉梁墓的年代为北齐后期^[21],也应属于本期。

四、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发展与演变

根据目前资料,无论形式、布局还是内容,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都体现出相应的发展和演变,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特征,而这与墓葬形制的发展变化也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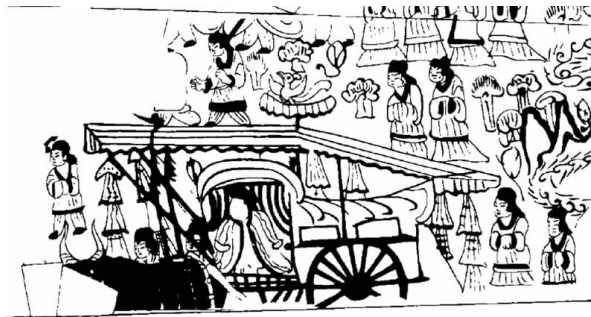
从形式与布局来看,前三期即北魏时期的墓室画像形式主要有壁画、石椁壁画、棺板画、漆画等,但壁画不太发达,即使高等级的墓葬中也很少见到,而且壁画的位置单一,面积有限,多在甬道及墓室四壁绘制,墓道基本不见壁画。由于此时期墓室画像形式较多,加之保存状况均不甚良好,故各种形式的墓室画像布局虽有共同特征,但不甚明确。第四期即北齐时期则有显著不同。墓室画像的表现形式趋于统一,基本为壁画,而且规模宏大,绘制精良。壁画开始向墓室外延伸,除墓室四壁及甬道外,有的墓道两侧壁、天井、墓顶等处均满绘壁画,极尽奢华。布局方面,壁画多分栏布置,一般为2~3栏,等级较高的墓葬如娄睿墓壁画局部多达4栏,并根据部位的不同,绘制不同的内容。

内容方面,山西地区北朝时期不同阶段的墓室画像既有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如多见墓主夫妇并坐像(图五)、宴饮、乐舞杂技、牛车出行(图六)、四神羽人、神异动物等,同时不同时期的墓室画像又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特点,并体

现出相应的社会内容。

属于第一期的墓室画像相对较少,典型的如大同沙岭 M7 壁画与漆皮等。壁画与漆皮内容涉及奇珍异兽、车马出行、男女墓主并坐宴饮、乐伎表演、粮仓、车辆、毡帐、杀羊、庖厨炊作、打场劳作、酿酒、伏羲、女娲等多个场面和形象。内容从总体上看是汉画传统的延续,如墓主夫妇并坐宴饮,男主人手中持麈尾的画面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如河北安平逯家庄墓^[22],体现出典型的汉文化特征。沙岭 M7 的壁画内容也不乏鲜卑民族特色,一些生活场面如打场、宰羊、酿酒等不见于其他墓室画像。沙岭 M7 中还绘有毡帐,这也是游牧民族居住方式的体现。在魏晋时期壁画中流行的车马出行图中,一般有两组,男性墓主骑骏马,女性墓主坐于华美的牛车之上,而沙岭 M7 壁画中的出行图表现的则是男性墓主坐于马车之上,墓主前后绘有很多骑兵与马上军乐,这正反映出鲜卑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兵种的特色,与魏晋传统明显不同^[23]。沙岭 M7 的年代为435年,此时北魏尚未统一黄河流域,而该墓的墓室画像及相关内容恰恰反映出北魏正处于与汉文化融合的初始期,汉文化已开始对其产生影响,但更多鲜卑传统被保留,文化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第二期相关墓室画像的考古资料相对较为丰富。宋绍祖墓石椁壁画(477年)、司马金龙墓漆板画(484年)、大同南郊 M229 棺板画、智家堡墓棺板画、智家堡墓石椁壁画、湖东 M1 棺板漆画、文瀛路 M1 壁画和云波里路 M1 壁画等均属于第二期。部分墓室画像的内容与沙岭 M7 相似,如表现墓主夫妇并坐宴饮、牛车出行、乐舞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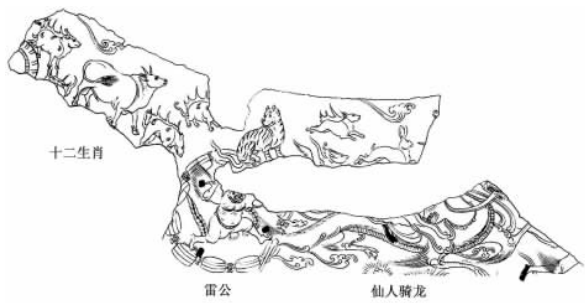
图六 牛车出行图(智家堡棺板画)

技等场景。沙岭 M7 的墓室画像中人物均穿着鲜卑装,即男女均带鲜卑垂裙皂帽,男性上衣下裤(袴褶服),女性上衣下裙,这是太和改制之前的主流服饰^[24]。相关服饰在这一时期的墓室画像中也较常见。此阶段的墓室画像中,狩猎场景(图七)也常常表现出来,如大同南郊 M229 棺板画等,这是北方鲜卑民族游牧狩猎习俗的再现。从以上几点来看,此阶段的墓室画像仍然有较多鲜卑传统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板画^[25]则完全是汉文化的体现:内容为汉代就已盛行且出现频率较高的圣君、忠臣、孝子、烈女、义士、节妇等孝悌主题,画中所绘人物皆褒衣博带,与鲜卑装明显不同,是典型的汉人服饰(在宋绍祖墓石椁壁画中也可看到有穿着汉人服饰的人物形象)。由此可见,本阶段鲜卑文化与汉文化杂糅共存,正在有机融合的过程之中。此外,作为装饰的忍冬纹在此期也较为常见,这可能与北魏时期佛教盛行有关。

陈庄墓壁画与方兴石棺画(520 年)等是第三期墓室画像的代表。此期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旧都平城已逐渐衰落,但此期的墓室画像在第二期的基础上仍有一定发展。虽然主要内容仍是墓主生前场景的再现,如夫妇并坐宴饮、乐舞杂技、出行狩猎等,但此期出现了以升仙为主的墓室画像,如方兴石棺画中墓主骑青龙升天的内容,反映出“乘云气,御飞龙,以游乎四海之外”^[26]的升仙思想。虽然在前一期的画像中也有一些羽人等与升仙相关的形象,如智家堡石椁壁画的羽人形象,但并非是画像主体,且升仙内容也并未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此外,对比同时期洛阳地区的北魏后期墓室画像可以发现,“孝悌”主题在本期洛阳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尤以石棺画像最为突出^[27],但平城地区已基本不见类似题材。属



图七 狩猎图(大同南郊北魏 M229 棺板画)



图八 升仙图(娄睿墓壁画)

第二期的司马金龙墓漆画中的忠孝节义主题似乎并未在平城有所延续,而是随着都城的迁移在洛阳地区推行开来。总的看来,此期的墓室画像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对汉画传统的继承与再现,而北魏经过太和改制之后,进一步吸收和继承了汉文化传统,汉化程度提高。

第四期即北齐时期,山西地区北朝墓葬的墓室画像有了更大发展,属于本期的墓室画像有寿阳库狄迴洛墓壁画(562 年)、太原热电厂墓壁画、太原娄睿墓壁画(570 年)、太原徐显秀墓壁画(571 年)、朔州水泉梁墓壁画等。除延续前三期描绘墓主生前生活场景,如夫妇并坐宴饮、鞍马牛车出行之外,升仙图(图八)在第三期的基础上得到较大发展,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壁画的中上部都绘有升仙图,包括仙人骑龙、仙人骑虎、灵魂飞升西方净土、四神、雷公、羽人等场面和形象。升仙图是汉墓壁画除忠孝节义外另一个重要题材,北齐时期升仙图的大量出现,体现了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对相关传统的恢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与邺都”^[28],而晋阳作为北齐的陪都,与邺城关系密切,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墓室壁画中出现升仙图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期的壁画布局与内容紧密相连,似乎形成了某种定制,即墓道、天井、过洞多绘大型军马仪仗,甬道则绘门吏仪卫,墓门上绘有四神形象,墓室四壁描绘墓主夫妇并坐宴饮、鞍马牛车出行等场景,墓室上部及墓顶绘升仙图、天象图。其内容突出强调了墓主的等级身份,并通过仪仗、出行队列、属吏等多方位地表现出来,而对北魏时期常见的狩猎、庖厨等生活场景则较少描绘。

通过上文分析知,可将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发展演变概括为以下四点。

1. 墓室画像形式上由棺板画、漆画、壁画、石椁壁画等统一为墓室壁画,布局与内容逐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定制,墓室画像面积扩大,渐趋奢华与精良。

2. 反映墓主生前的生活场景,如庖厨奉食、乐舞、狩猎、打场等场面不断减少,直至消失,以体现墓主身份地位的墓室画像渐趋成为主要表现内容。

3. 鲜卑民族特色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汉文化的吸收与继承,墓主夫妇并坐持节、牛车出行、升仙图等大量出现。

4. 发展中有所亦创新,如墓室壁画形成一定的规制。

综上所述,山西地区北朝墓室画像的形式由多样到统一,布局与内容也逐渐形成定制,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结合自身发展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墓室画像,反映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 李梅田《北朝墓室画像的区域性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2][2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2008年。

[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5]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5年。

[6] 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第12期。

[7] 刘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文物》2004年第12期。

[8]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9]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1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

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11][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12] 王太明《榆社县发现一批石棺》,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省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9-123页。

[13] 王克林《北齐庠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4][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朔州市文物局、崇福寺文物管理所《山西朔州市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2期。

[1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19] 山西地区在北朝后期在东魏-北齐版图范围内,未发现西魏-北周时期的墓葬,另外,本文墓葬资料时间截止至北齐被北周灭亡,即公元577年。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24] “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官,各有差次。”参见(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八之四《志第一三·礼志第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7页。

[25] 采自扬之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

[26] 曹础基《庄子浅注·逍遥游》,中华书局,2000年,第9页。

[27] 参见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2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